



我们
时代的
诗人

出版中心

陈东东 — 著

我们

时代的

诗人

东方出版中心

陈东东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时代的诗人/陈东东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7. 4

ISBN 978-7-5473-1088-5

I. ①我…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3574 号

我们时代的诗人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42 千字

印 张: 6.875 插页 2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1088-5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52069798

—— 弁言 ——

2015年,《收获》杂志开设专栏“明亮的星”,这个出自约翰·济慈诗句的栏名指向诗人——希望由诗人来讲述如明亮的星一般高悬于诗歌夜空的那么一些当代诗人。我应约而写的第一位诗人是我的好友,病逝于2010年的张枣。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又为这个专栏写了昌耀、郭路生(食指)与骆一禾。早在1998年,我就曾为上海《青年报》写过一篇关于昌耀的短文,并计划在这份报纸上陆续发表对那些我所认定的当代诗人的简要评介。然而接下来关于郭路生(食指)的一篇,却未能发表,也使得这个计划仅仅到计划为止。过了七八年,这个计划才在广州《南方都市报》以个人专栏的方式推进了一阵子,后来却又进行不下去了……去年开始为“明亮的星”写稿,重新唤醒了我当初的那个计划,《收获》杂志给出的篇幅,则更让那个计划升级——以此为契机,我索性就去把对中国当代诗人的讲述

写成一个系列，写成一部有结构布局的书。

它大概会由三十几个篇章组成（每个篇章两万字左右），伴随“明亮的星”专栏而走向完成。但它区别于那个并非由我一个人撰稿的专栏——它（我设想的书）素描我眼界里的中国当代诗人，勾勒我眼界里的当代汉诗轮廓。这会是一个历时好多年的进程，我不知道这么个进程何时才告结束。所以，听从东方出版中心郑纳新博士的建议，就先将已经写好的篇章单独编集成册——以后每完成五到六篇，即成一册——待终于写完全部（但愿这一天不会太远），再依照设想中的结构布局，去组合编辑修订完善它们。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也无意去成为这两种人物。我讲述我所选择的一些中国当代诗人，是想提供给对当代诗不甚了解的人们一个入门指引——在我看来，当代的诗歌教育（尤其在学校系统）完全阙如，必须（只能）由诗人自己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完成后的那本书，也可以是一个体量相对比较大的当代汉诗选本的构架，其中的每一篇，当然就是对入选诗人及其诗作的导读。不过，我的讲述一定基于我对我亦身在其中的中国当代诗歌写作场域的体会和见解，我对中国现当代诗歌乃至中国和世界诗歌（推而广之，可以说甚至包括全部人类文明和宇宙演化）的认知和见解。那么，因为刚刚指出的这两点，我的讲述也难免不会是一种批评，一部一个人的诗歌史。

于是又得进一步说明——这样一种意识会贯穿我的讲

述：现代汉诗（当代之前，它更多被称为“白话诗”和“新诗”）早已形成自己的传统，就像我正处于这个传统、正在为这个传统工作一样，我所讲述的那些诗人，也都自觉地贡献于这个值得信仰的传统。这种意识，显然由于古代汉诗传统和西方诗歌传统对现代汉语诗歌构成的所谓“两大阴影”，而更其鲜明和被强化；并因而更真切地发明和发现在现代汉诗这个历史短暂、远未完成的传统里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诸多可能性，以及要起而反对的东西。这种意识除了指向现代汉诗的“现代性”追求，我想，更指向现代汉诗的归根复命——能够在更大的范围里，跟历来的全部（无论古典和西方）文学构筑起共时并存的整体，成为共时并存的这个整体里的传统。而这正是我愿意去讲述跟我同时代的一些中国当代诗人的衷心。

陈东东

2016年12月1日

目录

弁言

斯人昌耀 / 1

郭路生是谁 / 49

圣者骆一禾 / 89

亲爱的张枣 / 131

大陆的鲁宾逊 / 191

斯人昌耀^①

1

昌耀的命运让我想起卡夫卡笔下的故事。小说《变形记》开头说，格里高尔·萨姆沙醒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而从午睡里起来走进会场的昌耀，发现自己变成了“右派”……小说《诉讼》的开头，也颇能说出昌耀的遭遇：“……一天早晨他没干什么坏事就被捕了。”那是开始于1957年的事情，昌耀当时二十一岁。之前一年，他加入了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到青海省文联任创作员兼《青海湖》杂志的编辑。他是共和国体制里的专职诗人、国家干部，却突然被判定为反社会主义制度和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分子。

共和国成立那年，他十三岁，依照将近半世纪后他在《〈昌耀的诗〉后记》里的说法，已“成长为一个懂事少年”。自作主张地，他从“湖南常德市一个正处在时代动荡多变中的大家庭”出走，

^① 本文所述昌耀生平事迹，主要依据昌耀诗文及李万庆《王昌耀：中国西部诗的创始人》（《人物》2006年第9期）和燎原《昌耀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永远地离开了故园……”那实在是王昌耀(他的本名)“为一系列时代风雨裹挟”的开端,1950年4月,他瞒着家人报考进中国人民解放军38军,成了一名文工队员——

那是开赴辽东边防的前几天,母亲终于打听到我住在一处临街店铺的小阁楼,她由人领着从一只小木梯爬上楼时我已经不好跑脱,于是耍赖皮似的躺在床铺上装睡。母亲已有两个多月没见到我了,坐在我身边唤我的名字,然而我却愣是紧闭起眼睛装着“醒不来”。母亲执一把蒲扇为我扇风,说道:“这孩子,看热出满头大汗。”她坐了一会儿,心疼我受窘的那副模样就下楼去了。战友们告诉我:“没事了,快睁开眼,你妈走了。”当我奔到窗口寻找母亲,她已走到街上,我只来得及见到她的背影。

《〈昌耀的诗〉后记》

昌耀说这是他“此生最为不忍的一幕”,这也是关乎其命运最为要紧的一幕吧?以后他没有再见过母亲,第二年他母亲“因贫病去世”,而他早已随军北上。

昌耀从小深爱着母亲。当他长成“懂事少年”,却那般决然地逃离母亲,弃家而去。他处于叛逆期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可谓强烈;但是其出走,不会没有时代风气的推波助澜。多少年过去,昌耀经历了他的整个人生,病榻之上、垂亡之际,他告诉他的红颜知己:“我只想为自己的灵魂找一个依托。”这话,可以被认为其少小离家动机最终的诗意表述。他挣脱母亲和家园的方式,实为一

次投身——昌耀自己则愿意用“过继”这个词。还是在那篇“后记”里，昌耀说他曾“在1953年写给北京一位叔叔的信里称‘党就是我的母亲，部队就是我的家’”。这是那个年代对个体进行体制化规训最为典型的用语，而昌耀将它们写进家书，则是一派衷心流露，当真就这么认为。“我的一生就是这样简略。”他接着说，“我于1951年春赴朝鲜作战，其间曾两度回国参加文化培训。我最后一次离开朝鲜是在1953年‘停战协定’签字前十余日，只因我在元山附近身负重伤。从此我永远离开了部队。1955年6月已在河北省荣军中学完成两年高中学业的我报名参加大西北开发。又越两年，我因诗作《林中试笛》被打成‘右派’……”

入伍以后，他一直就过着纪律严明的集体生活。即使作为一名国家干部参加大西北开发到了青海，其日常作息依然受到严格的管控。进入青海文联以后，他跟一批来自各地的文艺青年一起待在西宁大同街的一排小平房里，那儿属于省文联的办公小院，周日休假可以外出，晚七点前则必须回来，否则会按违纪论处。这种准军事化的生活样式，正是那个时代体制约束的一个缩影。他的青春年华被时代塑形，沿着身着志愿军军装入朝作战，携带的“武器”却是军鼓、曼陀铃和二胡这样的轨迹，成长为一个赞歌诗人。

昌耀属于随着共和国的成立开始出道的那代诗人，诗歌写作的年龄仅比共和国的年龄稍小一点点。1953年，他在上海的《文化学习》杂志首次发表作品，署名“志愿军战士王昌耀”，他开始写作练习的时间则一定还要早，或许正是在战火中的朝鲜。1954年，他的组诗《你为什么这般倔强——献给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

在《河北文艺》杂志发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一个诗人的出道，被认可，在那个年代，唯有顺着体制给出的途径——唯有通过各级刊物的正式发表，唯有加入作家协会……当然，也唯有以体制规定的笔调去写，以体制规定的嗓音去歌唱——这颇似“晚七点前必须回来”之类的“守则”。

昌耀忠诚地执守于体制里那个他衷心热爱的诗人岗位，自认并未违背什么“守则”，然而他有如格里高尔·萨姆沙或约瑟夫·K的遭遇，却意想不到地展开了。对待触目惊心的“反右”运动，就像对待之前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活动，昌耀有一种不去引人注意的淡漠（或许，他性格里的专注和一意孤行，全都给予了对诗的琢磨）。他不曾有过自以为“诤友”的言论，在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1957年6月12日）印发以后，他还是觉得事不关己，仍然常常因写作而熬夜，又往往在第二天中午补觉，以至睡过了头……直到那年7月的某个午后，他被人叫起，半醒着来到文联会议室鸦雀无声的人们中间，猛然看见他的《林中试笛》被用毛笔抄成大字贴在墙上，他这才愣怔而一下子被惊醒。

惊醒的昌耀却正沦入他此生的噩梦。《林中试笛》被加上“反映出作者的恶毒性阴暗情绪，编辑部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它是毒草”的编者按，特意“正式”地发表在1957年第八期的《青海湖》上，继而引来了批判文章。11月20日，定性昌耀为“右派”和“异己分子”的《结论材料》下达，他被送到农业合作社“监督劳动”三个月，地点在青海省湟源县日月乡下若约村。

噩梦的另一部分是，昌耀始终都不知道他究竟凭什么获罪，以其顽固执拗的脾气，必会有受家长冤枉的孩子似的反弹，而这

又迅速加剧了噩梦。在下若约村，昌耀一边用劳动洗刷自己，一边写下了近万言的“辩护书”。他的弄不清状况还在于，自认为依然是国家干部，依然享有生活的权利，不出工的时候，还会在借住的藏民家里摆弄乐器。很快，一天夜里，湟源县公安局开来一辆吉普车，昌耀被押解到看守所成了囚徒——“管制三年，送去劳教”。三年过去，劳教期满，昌耀仍然以戴罪之身被强制劳动；转过年，法院觉得出错，针对其劳教发出了“原判不当，故予撤销”的文书，但体制却周转不灵地还是把他当成一个被劳教者，予以重体力劳动的惩罚，直到1979年……

1962年夏天，昌耀又写了近两万字的《甄别材料》为自己申诉，曲折地企图通过亲戚和朋友关系递交首都北京的主事者。当年9月23日，昌耀如他在那天深夜写于旅邸的诗作《夜谭》所述，随“搭乘的长途车一路奔逐”来到“谁也不再认识我”的省会西宁，也是为了专门送上他的申诉，然而投书无门。想象那个情境，或许跟卡夫卡短篇《在法的门前》的开头一样：“法的门前站着一个人。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这个守门人跟前，请求让他进法的门里去。可是，守门人说，现在不能让他进去。”于是——

今夜，我唱一支非听觉所能感知的谣曲，
只唱给你——囚禁在时装橱窗的木制女郎……

（《夜谭》）

囚禁中的木制女郎，不过是昌耀身份的镜像。他这个被囚禁

者的身份，甚至在 1965 年被摘去“右派”帽子后依然如故。至于怎么就不再是“右派”了，就跟怎么成了“右派”一样让昌耀弄不明白。明白无误的是，从青海省第一劳教所到祁连山腹地的八宝农场，再到青海湖南边的新哲农场，他照样活在他的苦役和流放生涯里。

2

1979 年后昌耀屡次編集汰选自己的作品，对 1967 年以前的早期诗歌，往往多有删削改订，更有推倒重来的再创作，唯《林中试笛》，仍保留 1957 年为将他判定“右派”而刊发在《青海湖》上的原貌。昌耀此举，或许也为了让后世读者“甄别”，看看到底“何罪之有”。《〈昌耀的诗〉后记》里，他录入《林中试笛》两首诗的其中一首，作为“史实”，“立此存照”：

车轮

唉，这腐朽的车轮，这孤零的车轮……就让它燃起我们熊熊的篝火，加入我们激昂的高歌吧

——勘探者语

在林中沼泽里有一只残缺的车轮
暖洋洋地映着半圈浑浊的阴影
它似乎有旧日的春梦，常年不醒
任凭磷火跳越，蛙声喧腾

车队日夜从林边滚过
长路上日夜浮着烟尘
但是，它却再不能和长路热恋
静静地躺着，似乎在等着意外的主人……

昌耀响应开发大西北的号召来到青海，他的这首诗，正是忠于职守地讴歌开发者的短章，其意大概出于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句。勘探车队滚过的时代车轮与废弃车轮间的新旧对比，便是昌耀的感慨所系，他赞美勘探者将旧事物燃为新的篝火。《林中试笛》中的另一短章《野羊》，则叹息林中青羊兀自格斗，而不知开发大军的到来，猎枪已经对准了它们——野羊可做成勘探者的美味鲜汤，跟废胎可燃作篝火用意近似，成诗却显然更为勉强。

他来到青海后发表的那些诗作，如1955年9月的《船儿啊》（后改为《船，或工程脚手架》）、1956年的《鲁沙尔灯节速写》（组诗）、《山村夜话》、《弯弯山道》和1957年的《啊，黄河》（后改为《水色朦胧的黄河晨渡》）等，也多赞美开发者形象和刻画具有西部特征的劳动场景，并不荒腔走调于那个时代的政治旋律；即如当时没有发表，后经整理收入诗集的《鹰·雪·牧人》（1956年11月）、《边城》（1957年7月）、《高车》（1957年7月）、《月亮与少女》（1957年7月）等，也只是诗意化西部的风光人文历史，或是将之升华为一种英雄主义。反正，昌耀那时的诗，与所谓“恶毒性阴暗情绪”的“毒草”毫不相干。

于是，跟曼杰斯塔姆因刻意写下关于斯大林的政治讽刺诗，并在朋友们中间背诵而遭流放很不一样，昌耀的因诗罹难，被监

督劳动、囚禁、劳改、苦役和流放，的确显出卡夫卡式的诡谲和荒诞，让人，当然首先是让昌耀自己感到错愕、冤屈和灭顶。而他在被剥夺了写诗乃至做人权利的境地，企图申雪其诗以重新为人的勉力撑持，也尤其那么的卡夫卡式……

这导致1985年秋天（此时昌耀已回到其体制里的位置），他写下一则卡夫卡式的寓言。在我看来，这篇《巴比伦空中花园遗事》，将昌耀在时代上下文语境里为其命运挣扎的心曲和境遇揭露无遗：

巴比伦少年得知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要在空中花园加造九层别馆时，施工的刑徒们已在高耸入云的塔顶擂动铁锤，整个建筑如风中花木落英缤纷。

巴比伦少年于是向国王如是吁求：主人，我为你的冒险惴惴不安，不只是为着原有的殷忧。其实你本该意识到悬苑底座石墙的蛇形裂隙原就是我们的心病，即便梦中我也随时听到那物蛀蚀其间如逐渐展开的预谋……

无人应声。而激动得发抖的少年其实已近于啼哭着了，他从匍匐的地上仰面举起双臂如此吟唤道：主人啊，请加惠王国臣民！

那时他领悟到是自己的最后时刻了，就走到那面石墙纵身飞起，将自己当作一颗铆钉铆进墙隙。至今骆驼商旅途经王城废墟时还能在夕阳西照中看到少年的身子斜攀在残壁像一柄悬剑，他对王国的耿耿忠介反倒给虚无主义的现代人留下了可为奚落的口实。

最后那句话，既是写这则寓言时昌耀反思其命运症结的一声叹息，也是他当初沦为“右派”时蒙冤心态的又一次折射。

巴比伦少年，正像是昌耀对三十年前自觉“过继”的那个昌耀形象的描绘。甚至在他的诗已经遭到批判，他被判定为“右派”的时候，他还在写《寄语三章》这样的诗。其第一节：“地平线上那轰隆隆的车队/……轮胎深深地划破这泥土。/大地啊，你不是早就渴望这热切的爱情？”正呼应着那首《车轮》；而第三节里“怦怦然心动”于“古之大河”“浩浩荡荡轰轰烈烈铺天盖地朝我腾飞而来”，“于瑞气鳞光之中咏者歌者并手舞足蹈者”，真的就有巴比伦少年“纵身飞起”的姿势。

成了囚徒，他依然在写诗。1958年正搞“大跃进”，昌耀被选为看守所里“有文化的犯人”送往青海省劳教所的新生铸件厂学习炼钢，然后被羁押到日月乡下若约村以南不到八公里的哈拉库图，作为戴罪的技术人员参加到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去。《哈拉库图人与钢铁》，正是其汇入铺天盖地的大跃进诗歌合唱的一首长诗，只要摘出“钢铁就要上马了”这种让人失笑的修辞，就能见出昌耀这件作品对形势的迎合。不过值得注目一下这首长诗加括号的副题——（一个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心灵笔记）——其中真就有“激动得发抖的少年其实已近于啼哭着了”的表情。

1991年在《工厂：梦眼与现实》里，昌耀确认了他参与大炼钢铁时的这种表情，他回顾说：“……这种前所未有的对于参与大工业操作的体验甚至让我感到有几分豪迈……红色的火焰就更显得是我理想中那份撩动的样子而感人肺腑了。理智与情感都让我尽量在想象中否认这是事实上的一座监狱工厂……鼓风机与

炉膛的吼声都让我看作是受无产者驱动的可感豪迈的自然力、一种诗意的节奏……”昌耀又特写一位“壮实”的“佩戴脚镣的同犯”炼钢时“脸上的与其高大体魄不甚相容的温驯笑容”，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同在现场的昌耀的表情。不过，终于他意识到，“这一切，以至化铁炉、熊熊火炬在内的被我意念作用了的物象纯是出于一种梦眼中的与我身份不适的自作多情”。而这也是他噩梦的一部分。

3

1987年，就“作家是怎样走上创作道路的”这一话题，昌耀写下《艰难之思》一文，其中讲述了变成“右派”、被送去“劳教”以后，他经历着怎样一种改造：

1958年5月，我们一群囚徒从湟源看守所里拉出来驱往北山崖头开凿一座土方工程。我气喘吁吁与前面的犯人共抬一副驮桶（这是青海一带特有的扁圆形长腰吊桶，原为架在驴马鞍背运水使用，满载约可二百余斤）。我们被夹挤在爬坡的行列中间，枪口下的囚徒们紧张而悚然地默默登行着。看守人员前后左右一声声地呵斥。这是十足的驱赶。我用双手紧紧撑着因坡度升起从抬杠滑落到这一侧而抵住了我胸口的吊桶，像一个绝望的人意识到末日来临，我带着一身泥水、汗水不断踏空脚底松动的土石，趑趄着，送上艰难的每一步。感到再也吃不消，感到肺叶的喘息呛出了血腥。感到不如死去，而有心即刻栽倒以葬身背后的深渊……